

松柏汉墓 35 号木牍侯国问题初探

马 孟 龙

内容提要：新近公布的荆州纪南松柏汉墓 35 号木牍是研究西汉南郡政区地理的重要材料，同时木牍文书所涉侯国也反映出汉代侯国制度的一些问题。本文通过结合传世文献及考古材料，着重分析木牍文书所涉软侯国、襄平侯中庐、便侯国相关问题，提出软侯国地望可明确在今河南光山县境；汉初软侯国地处中央直辖区域，并不在淮南国境内；西汉早期衡山郡北界在大别山一线，景帝以后衡山国始有大别山以北地；木牍文书中“襄平侯中庐”这一特殊书写格式实为西汉“侯国别邑”制度的反映；而文书中的南郡便侯国是侯国迁徙后的结果，已非初封所在。

关键词：木牍文书 软侯国地望 衡山郡（国） 政区沿革 侯国别邑 侯国迁徙

2008 年第 4 期《文物》月刊公布了湖北荆州纪南松柏汉墓发掘简报。^① 根据简报介绍，该墓出土了 63 块木牍及木简 10 枚，内容包括遣书、簿册、叶书、令、历谱、公文抄件等文书。简报还完整公布了编号为 35 号木牍的照片和释文。从释文来看，该木牍实际是南郡免老簿、新傅簿、罷癯簿三份文书。木牍所涉及的南郡为景帝中元二年（前 148）临江国除国后所复置。^② 而木牍中出现的沙羨、安陆两县以及软侯国在《汉书·地理志》（以下简称《汉志》）中属江夏郡。据周振鹤先生考订，江夏郡为汉武帝元狩二年（前 121）“割衡山郡西部和南郡东部数县置”^③。因此，35 号木牍所反映的南郡资料应该是江夏郡设立以前的情况，该木牍的时代断限可确定在景帝中元二年至武帝元狩二年之间。另据简报介绍，松柏汉墓出土有汉武帝建元、元光年间的历谱，而该墓葬“与荆州高台秦汉墓二期四段墓葬（元狩五年以前的武帝初年）的特点相似”。简报撰写者推断松柏汉墓的年代“为汉武帝早期”。若以墓中同出历谱分析，35 号木牍之时代应与历谱所载年代接近，其为武帝早期建元、元光、元朔年间（前 140—前 123）文书的可能性较大。

① 荆州博物馆：《湖北荆州纪南松柏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08 年第 4 期。

② 临江国为景帝二年（前 155）以南郡改置。但就松柏汉墓的时代特点来看，可以排除木牍所涉南郡为高帝五年至景帝二年之南郡的可能。有关西汉南郡沿革，参见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 134—135 页。

③ 《西汉政区地理》，第 53 页。

根据木牍释文可知,当时的南郡辖有巫、秭归、夷道、夷陵、醴阳、孱陵、州陵、沙羨、安陆、宜成、临沮、显陵、江陵十三县道,郢、便、软三侯国以及“襄平侯中庐”^①。以这一记载为基础,我们可以复原出武帝早期的南郡辖区范围。^②(参见图一)由于三份文书详细记录了南郡所辖县道侯国相关人口统计数字,因此对研究汉武帝早期南郡的政区地理和人口地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特别是该文书所涉及的软侯国、襄平侯中庐、便侯国,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西汉南郡政区变化以及西汉侯国制度的一些问题。本文结合文献记载和相关考古材料,就木牍所涉及的侯国问题陈述个人的看法,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 软侯国及相关历史地理问题

有关软侯国地望,存在两种不同的说法。《汉志》江夏郡有软县,自注云:“故弦子国。”由弦子国地望可推知,《汉志》软县在今河南光山县境。^③而《水经·江水注》载:“又东迳软县故城南……汉惠帝二年,封长沙相利仓为侯国,城在山之阳,南对五洲也……湖水又南流,迳软县东而南流注于江,是曰希水口者也。”^④根据《水经注》的记载,汉软县在希水与长江交汇之处,为今湖北浠水县境。本来《汉志》对于软县方位的记载比较明确,但因《水经注》明言希水口的软县是利仓受封之国,这就给后世判断软县所在带来了麻烦。明清以来的地理志大多采取两说并存的处理方法。如《读史方輿纪要》和《大清一统志》就把软县故城分别记于河南光山县和湖北蕲水县下。王先谦在《汉书补注》中也难断是非,只得在软侯条下注称:“软,见《志》,亦见《江水注》。”^⑤

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使墓主软侯的封国所在引起学界关注。当年7月出版的《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简报》依据《水经注》定软侯国在湖北浠水县。同年9月,《文物》月刊发表了马雍先生和黄盛璋先生有关马王堆汉墓的两篇论文。^⑥两位先生都认为软侯国应位于光山县,浠水县之软县乃东晋时代的侨县。此后,两位

① 关于“襄平侯中庐”的性质,详见下文所述。释文参看《湖北荆州纪南松柏汉墓发掘简报》。

② 有关35号木牍所载南郡政区范围的复原,参见刘瑞《武帝早期的南郡政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年第1期。

③ 《汉志》软县地望的考定,可参见黄盛璋、钮仲勋《有关马王堆汉墓的历史地理问题》,《文物》1972年第9期。后收入黄盛璋《历史地理论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80—49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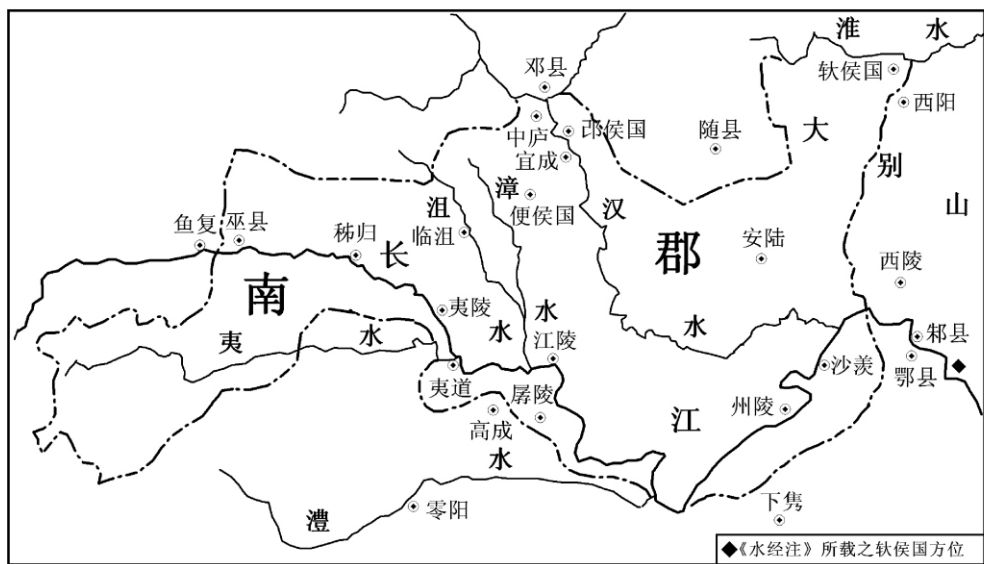
④ [清]杨守敬、熊会贞疏,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水经注疏》卷三五,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918—2920页。

⑤ [清]王先谦《汉书补注》年表第4卷《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软侯条,光绪二十六年虚受堂刊本,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3年,第257页。

⑥ 马雍《软侯和长沙国丞相》,《文物》1972年第9期;黄盛璋、钮仲勋《有关马王堆汉墓的历史地理问题》。

先生的看法逐渐为学界接受。1973 年正式发表的《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报告即采纳了这一观点。

现在 35 号木牍释文的公布，为河南光山说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就 35 号木牍所反映的南郡政区来看，其东界在安陆、沙羡一线，而今湖北浠水县的软县故城远在此线之外（参看图一）。因此，35 号木牍之软侯国只可能是光山县的软县故城，而不会在浠水县。不过李开元先生认为，今河南光山境内的软侯国是文帝侯国迁徙政策执行后，从湖北浠水迁徙过去的。^① 就这一推论，35 号木牍还不能予以佐证，只能期待新材料的发现。



图一 武帝早期南郡范围图^②

陈苏镇先生曾利用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以下简称《秩律》）钩稽汉初中央直辖区域的东界范围，指出江淮地区的郡国分界在阳安、朗陵、比阳、平氏、

^① 李开元：《西汉软国所在与文帝的侯国迁移策》，《国学研究》第 2 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年。

^② 此图所示南郡政区范围据 35 号木牍复原，因醴阳、显陵的地望无法确定，故未在图中标绘。底图据《中国历史地图集》西汉“荆州刺史部”图改绘。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 2 册，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 年，第 22—23 页。此图曾被刘瑞《武帝早期的南郡政区》一文引用。

胡（湖）阳、春陵、随、西陵、沙羨、州陵一线（见图二）^①。若按照陈先生的划界，则诸侯王国在淮水、大别山之间深嵌入汉郡数百里。现据 35 号木牍可知，淮水、大别山之间正是软侯国地。^② 软侯国与南郡、南阳郡接壤，而吴楚之乱以前，侯国领地由中央直属，则软侯国当视为中央直辖区域。^③ 因此，高后时期江淮一带的郡国分界可修正为阳安、慎阳、软侯国、西陵、沙羨、州陵一线。^④（见图二）此界线较陈先生的分界更为平整，应当符合汉初郡国形势。^⑤ 这样看来，李开元先生和陈苏镇先生有关光山县之软侯国汉初位于淮南国境内的说法难以成立。^⑥ 实际情况应该是，惠帝二年软侯国分封之后一直处于中央控制之下，吴楚之乱后明确为南郡所统辖。因此，如果软侯始封之地确在光山县境，则文帝时期完全没有迁出的必要。而 35 号木牍进一步证实，武帝早期软侯国仍处于光山原地，所以陈先生将软侯国列入文帝所迁出的淮南国三侯邑并不妥当。^⑦

① 见陈苏镇《汉初王国制度考述》，《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3期。笔者按，《秩律》中的春陵，简文作南陵，整理者疑为“春陵”之误，陈先生采纳了这一观点。其实南阳郡的春陵是汉元帝时期从零陵郡迁置而来，周振鹤先生已有辩证。见周振鹤《〈二年律令·秩律〉的历史地理意义》，《学术月刊》2003年第1期。

② 根据《中国历史地图集》，软侯国与南阳郡之间尚有钟武侯国和鄆县。而钟武、鄆 35 号木牍无载，可知钟武侯国和鄆县在武帝早期尚未设置。钟武侯国为宣帝始封，初封于零陵郡，后徙封于江夏郡。详说见后。

③ 周振鹤先生和李开元先生都认为汉初的侯国由中央直属（见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第6页、李开元《西汉软国所在与文帝的侯国迁移策》）。不过陈苏镇先生认为汉初的侯国在汉郡中的由汉郡管辖，在王国中的由王国管辖（见陈苏镇《汉初侯国隶属关系考》，《文史》2005年第1辑）。但就《秩律》和 35 号木牍所反映的郡国分界来看，即使陈说不误，软侯国属南郡的可能性也要更大一些。

④ 此分界中所采用的慎阳，主要依据晏昌贵先生考证。参见晏昌贵《〈二年律令·秩律〉与汉初政区地理》，《历史地理》第21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⑤ 陈苏镇先生以软侯国不见于《秩律》，且位于胡阳、春陵、随一线以东而认定软侯国位于淮南国的推论存在疏漏。高帝、惠帝时期，先后分封侯国一百四十个，而见于《秩律》的仅十余个（此据周振鹤先生统计，见《〈二年律令·秩律〉的历史地理意义》）。可见，侯国不一定都见于《秩律》。参见陈苏镇《汉文帝“易侯邑”及“令列侯之国”考辨》，《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

⑥ 李开元先生认为，“北软（即光山县之软故城——笔者注）当本为淮南国领土”，文帝时“已经由淮南国削除编入于汉南郡”。（见《西汉软国所在与文帝的侯国迁移策》）陈苏镇先生也称“汉初软侯的封邑无论在今光山还是在今浠水，都在淮南国境内。”（见《汉文帝“易侯邑”及“令列侯之国”考辨》）

⑦ 《汉书》卷四四《淮南王传》记载文帝时将淮南国境内的三个侯邑迁出。陈苏镇先生考证此三侯邑为软、蓼、松兹，但又认为淮南王舅父赵兼亦在侯邑迁出之列（见《汉文帝“易侯邑”及“令列侯之国”考辨》）。这样则文帝时从淮南国迁出的侯邑不止三个。今按，软侯国汉初并不在淮南国境，实无迁徙的必要。而蓼侯国也不可简单比附为淮南国之蓼县（关于蓼侯国地望问题，笔者将另撰文予以探讨）。陈先生在考证淮南三侯邑时漏掉了期思侯国。若以期思、松兹再加上赵兼之侯邑则正好与三侯邑之数相符。

管辖。^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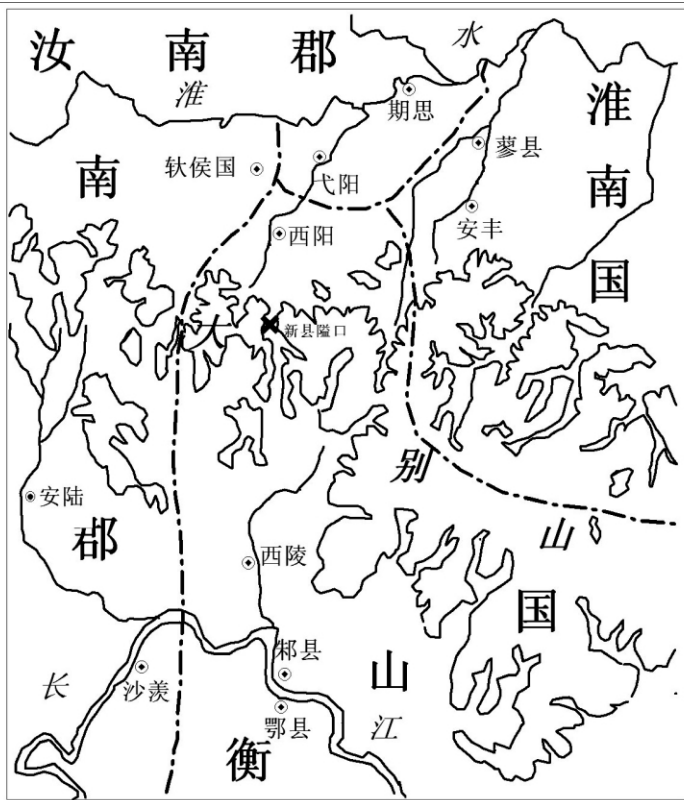
图三 高后二年南郡、九江郡、衡山郡分界示意图

另外，就西阳县周边的地理环境来看，西阳县与衡山郡治邾县之间的联系必须通过南部大别山的新县隘口。而位于新县隘口以南的西陵县在《秩律》中已经出现，根据简文中西陵县的位置关系，其属南郡无疑。^②如此一来，高后时期的淮南国衡山郡不可能越西陵县而有西阳县地。高后时期的西阳县应当归属淮南国九江郡管辖。这一时期的淮南国衡山郡北界当在大别山一线（见图三）。而在35号木牍中，南郡辖县已不见西陵，说明西陵已划入衡山国。因此武帝早期的衡山国则可能越大别山而有西阳县（见图四）。景帝四年（前153）吴楚之乱平定后，景帝对淮南三国作重大调整。是年，景帝徙衡山王刘勃为济北王，徙庐江王刘赐为衡山王，将庐江国所辖庐江、豫章二郡收归中央。笔者推测，南郡西陵县和原属淮南国的西阳县当于这一年或

① 周振鹤先生也推测：“元朔六年衡山王子终弋侯别属汝南，元鼎五年免侯后，恐即并入弋阳县。”（见《西汉政区地理》，第51页）可见终弋侯通过弋阳县归属汝南郡管辖并非没有可能。

② 见周振鹤《〈二年律令·秩律〉的历史地理意义》；晏昌贵《〈二年律令·秩律〉与汉初政区地理》。

此后不久划归衡山国所有。^①



图四 武帝元朔五年南郡、淮南国、衡山国分界示意图^②

通过对照图三、图四可以看出，汉初南郡、汝南郡和淮南国九江郡、衡山郡的分界主要利用了淮水和大别山一系列天然山川。而武帝时期南郡、汝南郡与淮南国、衡山国的分界则打破了高山大川的天然形势，汝南郡越淮河而有期思、弋阳两县，衡山国则越大别山领有西阳县。周振鹤先生曾指出，秦郡多以山川作为划界的基本依据，

① 据《史记》卷一一八《淮南衡山列传》，在吴楚七国之乱中衡山王拒绝参与反叛最为坚决，事后受到徙王济北的嘉奖。庐江王也没有响应叛乱，后得徙王江北，但庐江王原有庐江、豫章两郡地，徙封江北后只有衡山一郡地，因此景帝很有可能将原属南郡的西陵县划归衡山王所有。而淮南王曾有参与叛乱的打算，所以景帝可能将原属淮南的西阳削归衡山国。以上仅为笔者的推测，并无确凿依据，可备一解。

② 图三、图四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1:2300000 湖北省地形图改绘，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79年，第53页。

而汉郡因为分割、蚕食王国领域,出现郡界与山川界线不合的现象。^①具体到本文,图三所示汉初以山川形便为基础的郡国分界应当承袭自秦代,而武帝时期各郡国间犬牙交错的划界格局则显然与景帝以来削弱、蚕食诸侯王国政策执行有关。淮河、大别山之间郡国分界的变迁进一步验证了周先生的看法。而淮域一带郡国分界的犬牙相入,也使得淮南国、衡山国无法利用山川形胜割据自守,这使汉中央对江淮诸侯王国的控制大大加强。

根据《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所载,第四代软侯扶(《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作“秩”)于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嗣位,元封元年(前110)获罪除国。因此35号木牍所反映之软侯国应当是利扶在位时期的情况。

二 “襄平侯中庐”与西汉“侯国别邑”制度

35号木牍中,“襄平侯中庐”的书写格式比较奇特。中庐,《汉志》属南郡,与木牍所载相符。但阅检两汉史籍,不见其有置侯国的记载。如果中庐为襄平侯封国,在文书中写成襄平侯国即可。但如果中庐是南郡属县,与襄平侯无关,则只当书中庐二字。而且“襄平侯中庐”在木牍文书中的位置也很特别,恰好位于南郡所辖十三县和三侯国之间。种种迹象表明,襄平侯中庐在南郡的地位甚为特殊。那么中庐与襄平侯之间又存在怎样的关系?

我们先从襄平侯入手。据《史记》、《汉书》记载,西汉先后分封有两个襄平侯。一是高帝功臣纪通,一是广陵厉王子刘璽。^②据《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纪氏襄平侯始封于高帝八年(前199),除国于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另据《汉书·王子侯表》,刘璽受封于汉元帝永光五年(前39)。因此,35号木牍所涉襄平侯不会是刘璽之襄平侯,而只可能是纪氏襄平侯。

襄平侯国《汉志》载属临淮郡,具体地望无考。^③《汉志》临淮郡之襄平为刘璽侯国,历代注家均以为刘璽之襄平与纪通之襄平实为一地。司马贞称纪氏襄平“县

① 周振鹤:《中国历史上行政区域划界的两大原则——犬牙交错与山川形便》,《中国方域》1996年第6期。

② 《汉书》卷一五下《王子侯表第三下》记为广阳厉王子。王先谦注引刘攽曰:“无广阳厉王,当是广陵王。”(见《汉书补注》年表第3卷《王子侯表下》襄平侯条,第211页)周振鹤先生亦从广陵厉王之说。参见周振鹤《〈汉书·王子侯表〉笺证》(初刊《史念海先生八十寿辰学术文集》,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周振鹤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13页。

③ 《汉志》辽东郡亦有襄平。《水经注》卷一四《大辽水注》称此襄平为纪通之侯国。但辽东郡之襄平向为郡治所在,不当置侯国,《水经注》所载有误。全祖望、杨守敬皆以酈说为非。见《水经注疏》,第1267页。

名,属临淮”^①。王先谦亦称:“襄平,临淮县。国除。后封广陵厉王子𪔐。”^②《汉志》载临淮郡“武帝元狩六年置”。《西汉政区地理》称:“《汉志》临淮郡领县二十九,地跨淮水东西。其淮西部分由沛郡而来……淮东部分来自广陵郡。”^③由此可知,武帝早期并无临淮郡,当时的襄平侯国或处沛郡,或处广陵郡。《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载纪通受封缘由:“兵初起,纪成以将军从击破秦,入汉,定三秦,功比平定侯。战好时,死事。子通袭成功,侯。”^④第一代襄平侯纪通之父纪成在跟随刘邦入关中时就位居将军,应当很早追随刘邦起事。这样看来,纪成、纪通是丰沛人的可能性较大。^⑤而刘邦在分封功臣时,大多遵循故国本籍受封之原则,则纪通之襄平侯国当在临淮郡淮河以西的沛郡故地寻之。

排除了襄平侯国在南郡的可能,则 35 号木牍所涉“襄平侯中庐”只能解释为是属于襄平侯的一块“飞地”^⑥。其实,这种列侯领有飞地的情况在文献中可以找到依据,而此类“飞地”往往被称为侯国“别邑”。《汉书·张延寿传》:“延寿已历位九卿,既嗣侯,国在陈留,别邑在魏郡,租入岁千余万。”^⑦据《张延寿传》和《外戚恩泽侯表》,张延寿于元康四年嗣富平侯位。富平侯国在陈留郡,但在魏郡另有一处“别邑”。富平侯在魏郡之“别邑”,当为魏郡所属某县。^⑧居延汉简戍卒名籍簿中曾见有“□郡富平侯元城邑安昌里王青(EPT51·532)”残简。^⑨查图版,此简“郡”字以上残缺,但前一字左半下部存有“女”字的缺笔,结合名籍簿其他木简,“郡”字上所缺当为“魏”字,可与同探方所出“移魏郡元城建书曰命髡钳答二百□(EPT51·470)”残简中的“魏”字相对照。^⑩如此则可确知富平侯在魏郡所领有之

① 《史记》卷一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襄平侯条司马贞《索隐》,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59年,第947页。

② 《汉书补注》年表第4卷《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襄平侯条,第248页。

③ 《西汉政区地理》,第39页。

④ 《史记》卷一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襄平侯条司马贞《索隐》,第947页。

⑤ 《康熙顺庆府志》卷五《人物》收有纪成、纪通父子,称二人为安汉人。见[清]李成林修,罗成顺等纂《康熙顺庆府志》,嘉庆二十年补刻本,成都,巴蜀书社影印本,1992年(《中国地方志集成》),第514—515页。今按,《史表》载纪成“以将军从击破秦”。秦亡时,刘邦尚未入蜀。《康熙顺庆府志》之说显然有误,当为明清以后地方附会之辞,不足取信。

⑥ 对于中庐的飞地性质,刘瑞学长及周振鹤先生也有同样的看法。两位先生的看法参见《武帝早期的南郡政区》。

⑦ 《汉书》卷五九《张延寿传》,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64年,第2653页。

⑧ 《汉书》卷八《外戚恩泽侯表》载富平侯张安世于昭帝元凤六年受封,宣帝益封后的户数为“万三千六百四十户”。据《汉书》卷五九《张安世传》,本始元年宣帝曾益封张安世“万六千户”。由此可知,张安世始封时,受封户数为三千户,当为一乡之户数。其受宣帝所益封之一万六千户,当为一县之户数。此一万六千户极有可能就是富平侯在魏郡领有的“别邑”元城县的户数。另外,大将军霍光在宣帝本始元年所益封之一万七千户,便确知是河东郡河北县和东郡东武阳县两县户数(详说见后)。

⑨ 甘肃省文物考古所等合编《居延新简》,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91页(图版见200页)。

⑩ 《居延新简》,第89页(图版见198页)。

别邑为元城县。^① 检《中国历史地图集》，陈留郡与魏郡之间隔有东郡，则元城县是属于富平侯的一块飞地。值得注意的是，居延简所见“魏郡富平侯元城邑”与35号木牍所书“南郡襄平侯中庐”的书写格式基本一致，这对于我们理解襄平侯与中庐两者间的关系具有启发意义。^②

昭宣时期，权倾朝野的大将军霍光同样领有别邑。《汉书·外戚恩泽侯表》博陆侯霍光条下，署有北海、河间、东郡三郡。颜师古注曰：“光初封食北海、河间，后益封又食东郡。”王先谦进一步解说：“初封北海，食邑在此。后乃兼食二郡耳。”颜师古和王先谦有关霍光兼食数郡的说法恐不成立。有汉一代，未见列侯食一郡或兼食数郡的事例。对此，柳春藩先生已有怀疑，并作出比较合理的解释。他称：“《汉书·外戚恩泽侯表》，博陆侯霍光条下注：北海、河间、东郡，表明霍光食邑甚多，有属北海者，有属河间者，有属东郡者，并不是尽食三郡之地。”^③ 今按，博陆《汉志》无载，历代注家都称霍光封于北海郡，惟有臣瓚曰：“渔阳有博陆城也。”酈道元亦从此说。^④ 王先谦补注：“瓚说是也。侯国必有县，初封北海，食邑在此。”但霍光封于北海，食于渔阳也颇为费解。据《太平寰宇记》潍州昌邑县条：“霍侯山，在县南四十里。《汉书》：‘霍光为博陆侯，封在北海。’其山本名陆山，天宝六年敕改为霍侯山。”^⑤ 若《太平寰宇记》所载不误，则博陆侯国当在西汉北海郡都昌县境。由霍光始封三千户来看，博陆当为一乡之地。^⑥ 本始元年，初即位的宣帝对霍光等功臣予以封赐，其诏书载“以河北、东武阳益封光万七千户”^⑦。东武阳，《汉志》属东郡。河北，《汉志》属河东郡。《史记集解》引文颖曰：“食邑北海、河东。”^⑧ 此与

① 《汉书》卷五九《张纯传》载张纯：“建武中历位至大司空，更封富平之别乡为武始侯。”另《汉志》魏郡有武始县。钱大昭由此推测富平侯所领有之魏郡别邑为武始县（见《汉书补注》引钱大昭语，第1212页）。今人吴恂也持同样看法（见《汉书注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99—200页）。今按，富平侯所领有之魏郡别邑宣帝时已省并，至东汉张纯时，富平侯已无别邑。故张纯所封之武始，当从本传为富平县之别乡，与魏郡武始县同名，并非是富平侯之别邑，当以王先谦的意见为是。

② 居延 EPT51·532 号简中“富平侯元城邑”的书写体例曾引起冯小琴先生的注意，其看法是“元城曾一度作为富平侯食邑”，“在成帝时，富平侯食邑较多，势力颇大”（见《居延敦煌汉简所见汉代的“邑”》，《敦煌研究》1999年第1期）。冯先生据简文推知元城为富平侯食邑至确，但对富平侯领有元城邑的时代推断有误。今据张安世、张延寿本传，可知张安世领有元城始于宣帝本始元年（前73），但至子张延寿时已省并。张延寿于宣帝甘露三年（前51）薨，则元帝、成帝时期元城县已非富平侯所有。

③ 柳春藩：《秦汉封国食邑赐爵制》，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93页。

④ 《水经注疏》卷一四《鲍邱水注》，第1228页。

⑤ [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一八，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65页。

⑥ 《史记》卷二〇《建元以来侯者年表》记霍光始封户数三千户。《汉书》卷一八《外戚恩泽侯表》则记为二千三百五十户。据《汉书》卷六八《霍光传》，宣帝初即位益封霍光一万七千户，“与故所食凡两万户”。则知《史表》所载为是。

⑦ 《汉书》卷六八《霍光传》，第2947页。

⑧ 《史记》卷二〇《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博陆侯条《集解》引文颖语，第1059页。

《汉表》所载北海、河间、东郡不合。王先谦解释说：“河间、东郡误省为河东。”^①此可为一解。但还有一种可能，即文颖所见《汉表》与颜师古所见不同。文颖所见《汉表》明确书有河东郡，若文颖所见不误，则今本《汉表》之“河间”当为“河东”之误。^②霍光之封邑分处北海、河东、东郡三郡。这样看来，柳春藩先生的推断至确。河东郡河北县和东郡东武阳县都不与北海郡相接，两县是属于博陆侯的飞地，即“别邑”^③。再以武安侯田蚡为例。武安，《汉志》属魏郡。又《史记·河渠书》载武帝元光年间：“武安侯田蚡为丞相，其奉邑食鄆。鄆居河北，河决而南则鄆无水灾，邑收多。”^④鄆，《汉志》属清河郡。武安侯田蚡的封邑在魏郡武安县，但他在清河郡鄆县另有封邑。则鄆当为武安侯之“别邑”。^⑤

封君领有别邑的制度起源很早，春秋时代不乏公侯大夫兼食数邑的记载。时至战国，封君领有别邑的现象仍很普遍。如秦相魏冉，于秦昭王十六年封为穰侯，此后不久又“复益封陶”^⑥。又如齐将田单，《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载“齐封田单为安平君”。《正义》云：“安平城在青州临淄县东十九里，古纪之鄆邑也。”^⑦又据《战国

① 以上所引颜师古、臣瓚、文颖、王先谦诸说，俱见《汉书补注》年表第6卷《外戚恩泽侯表》博陆侯条，第283页。

② 《霍光传》“光为博陆侯”颜师古注引文颖曰：“食邑北海、河东城。”则颜师古所引文颖语与《集解》所引又有不同。《汉书补注》引齐召南语：“注‘河’字下脱‘间’字，‘城’则‘郡’之伪。恩泽侯表云北海、河间、东郡。师古注光初封食北海、河间，后益封又食东郡。可知此注脱误显然。”笔者按，齐召南称文颖语中“城”为“郡”之误可采，但称“河”下必脱“间”字，所据乃是颜师古之言。而颜师古所见《汉表》可能已有讹误，则“河”下亦存在脱漏“东”字的可能。古籍文献中常有脱漏重文符号“=”而产生讹误的现象（参见裘锡圭《考古发现的秦汉文字资料对于校对古籍的重要性》，《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5期）颜师古所引文颖曰“食邑北海、河东郡”，可能为“食邑北海、河东=郡”脱漏重文符号后的结果。这样则文颖所见之《汉表》当书为“北海、河东、东郡”。此聊备一说。杨守敬亦认为《汉表》“河间”为“河东”之误。见《水经注疏》，第1229页。

③ 《霍光传》载地节二年“光上书谢恩曰：‘愿分国邑三千户，以封兄孙奉车都尉山为列侯，奉兄票骑将军去病祀。’”《外戚恩泽侯表》乐平侯霍山条“地节二年四月癸巳以从祖祖父大将军光功封，三千户”。乐平，《汉志》无载，《汉表》注东郡。《续汉书·郡国志》东郡有乐平，本注曰：“故清，章帝更名。”《汉志》东郡清县条，王先谦补注“后汉改乐平，《续志》乐平，故清。《外戚表》乐平侯霍山注云东郡，则乐平不自后汉始有。或是清之乡聚，章帝因以名其县耳。”今据《中国历史地图集》西汉东郡图，东武阳与清为邻县，则乐平当本为东武阳之乡聚。地节二年，东武阳时为霍光别邑，故从中析三千户置乐平侯国。

④ 《史记》卷二九，第1409页。

⑤ 另据《史记》卷一九《惠景间侯者年表》及《汉书》卷一七《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孝景六年曾分封栾布为鄆侯。元狩六年，第二代鄆侯栾贲获罪国除，则元光年间鄆侯国尚存。这样看来，田蚡若以鄆为别邑，则栾氏鄆侯国当已迁往他地。今按，景帝中元三年曾于清河郡置国，封子乘。景帝时期，王国境内不置侯国渐成定制。所以鄆侯国很有可能会在此时迁往他郡。武帝建元五年，清河国除国为郡。建元六年，田蚡任丞相，鄆当于此时益封予武安侯。

⑥ 《史记》卷七二《穰侯列传》，第2325页。

⑦ 《史记》卷四六《田敬仲完世家》，第1901页。

策·齐策六》，齐襄王“益封安平君以夜邑万户”^①。亦知安平君田单领有别邑夜邑。秦汉之际，刘邦出于争夺天下的需要，广泛采取封君制激励部下为之效劳，其中不乏益封别邑的记载。《史记·曹相国世家》载，高祖元年曹参因击章邯有功而“赐食邑于宁秦”，次年又因平定魏地，虏魏王豹而“赐食邑平阳”。又如樊哙，刘邦还定三秦时“赐食邑杜之樊乡”，次年又因荥阳护卫有功而“益食平阴二千户”。^②《史记·滕公列传》：“汉王既至荥阳，收散兵，复振，赐婴食祈阳。复常奉车从击项籍，追至陈，卒定楚，至鲁，益食兹氏。”^③亦知夏侯婴除食有祈阳外，另有别邑兹氏。从以上记载来看，自战国迄于西汉，列侯领有别邑的情况一直存在。因此，襄平侯以南郡中庐县为别邑，就战国秦汉封君制度来说也解释得通。

第一代襄平侯纪通在平定诸吕之乱时曾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史记·吕太后本纪》载：“太尉欲入北军，不得入。襄平侯纪通尚符节，乃令持节矫内太尉北军。”^④正是由于襄平侯矫传符节，太尉周勃才得以控制北军并最终铲除诸吕。孝文帝即位伊始对平定诸吕的功臣进行封赏，其中特别提到襄平侯的功劳，并下诏益封“朱虚侯章、襄平侯通邑各二千户”^⑤。检《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惠帝、高后、文帝所分封的列侯，其食邑以千户居多。^⑥再辅以《表序》所言汉初情形，“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⑦。所以文帝益封襄平侯之二千户，已足够一县户数。因此，笔者推测35号木牍所涉之“襄平侯中庐”有可能就是文帝益封给襄平侯纪通的“别邑”。

通过上述分析笔者以为，35号木牍所见“襄平侯中庐”应是西汉侯国别邑制度在出土文献中的反映。根据《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所载，第二代襄平侯相夫于景帝中元三年（前147）嗣侯位，武帝元光六年（前129）薨。第三代襄平侯夷吾于元朔元年（前130）嗣侯位，元封元年（前110）薨。则35号木牍所涉襄平侯应当是相夫或夷吾。

三 便侯国迁徙考辨

有关便侯国的地望，历来的解释也存在分歧。《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便侯

① 诸祖耿撰《战国策集注汇考》卷一三《齐策六》“貂勃常恶田单”章，扬州，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684页。又同卷“田单将攻狄”章，鲁仲连谓田单曰：“当今将军，东有夜邑之奉。”第690页。

② 《史记》卷九五《樊哙列传》，第2655页。

③ 《史记》卷九五《滕公列传》，第2666页。

④ 《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第409页。

⑤ 《汉书》卷四《文帝纪》，第110页。

⑥ 柳春藩先生指出，高祖时平均每个列侯食邑二千一百四十二户，惠帝时食邑最多者是两千户，高后时最多者只有六百户，文帝时食邑最多者是两千户。见《秦汉封国食邑赐爵制》，第76页。

⑦ 《史记》卷一八《高祖功臣后表》，第877页。

条下书有“编”字。按，编县《汉志》属南郡。根据《汉表》这一书写体例，表明南郡之编县即是便侯国所在。但《汉志》桂阳郡下另有便县。《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便侯条《索隐》注曰：“《汉志》县名，属桂阳。音鞭。”^①司马贞认为桂阳郡之便县当为吴浅之便侯国。王先谦补注：“（编），南郡县。便，桂阳县。盖分编置。”^②王先谦认为便侯国是从南郡编县中析置而来，《汉表》所记不误。而 35 号木牍的发现，表明武帝早期的便侯国确实位于南郡境内，应当就是《汉志》南郡编县，《汉表》的记载及王先谦的见解是正确的。但王先谦有关便侯国是从编县中分置而来的说法并不准确。因为 35 号木牍中只有便侯国而无编县，说明便侯国并非析置于编县，反倒有可能是编县的前身。

35 号木牍的发现虽然使便侯国地望得以明确，但问题仍未解决，因为就汉代王子侯国分封制度而言，便侯国始封于南郡的可能性并不存在。《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载便侯吴浅受封缘由：“长沙王子，侯，二千户。”^③《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载：“以父长沙王功，侯，两千户。”^④《史表》和《汉表》均载，吴浅是因长沙王子的身份得以受封，所以吴浅属于王子侯。陈苏镇先生曾对惠帝、高后时期分封的七个王子侯国进行分析，最后的结论是，“文帝之前，王子封侯例皆置侯邑于本王国内”^⑤。而吴芮另一子吴阳于高后元年封为沅陵侯。^⑥沅陵《汉志》属武陵郡，汉初属长沙国无疑^⑦，可见长沙国王子侯邑之分封亦符合置邑于本王国内的通例。南郡在景帝之前一直由中央直辖，从未归属长沙国。所以长沙国之王子侯国若置于南郡，则与王子侯置侯邑于本王国内的通例不符。反观桂阳郡之便县，汉初属长沙国，因此吴浅之王子侯邑置于长沙国便县较之南郡更为合理。^⑧另据《水经·耒水注》“又北过便县之西”。注曰：“县故惠帝封长沙王子吴浅为侯国，王莽之便屏也。”全祖望据此推测：“按《汉表》以为江夏之编。《索隐》曰，县属桂阳。当从道元为是。浅以惠帝元年封。”^⑨《水经注》明载，桂阳郡之便县就是吴浅始封之便侯国。全祖望也认为

① 《史记》卷一九《惠景间侯者年表》便侯条，第 978 页。

② 《汉书补注》年表第 4 卷《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便侯条，第 257 页。

③ 《史记》卷一九《惠景间侯者年表》便侯条，第 978 页。

④ 《汉书》卷一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便侯条，第 618 页。

⑤ 陈苏镇：《汉文帝“易侯邑”及“令列侯之国”考辨》。

⑥ 《史记》卷一九《惠景间侯者年表》记载沅陵侯吴阳为“长沙嗣成王之子”。但《汉书》卷三四《吴芮传》载“至孝惠、高后时，封芮庶子二人为列侯，传国数世绝。”此二人必是指吴浅、吴阳，《史表》所记有误。李鄂权先生对此问题曾有简要考辨，可参考。见李鄂权《长沙国墓葬出土钤刻文字地望考证及相关问题研究》，《船山学刊》2002 年第 1 期。

⑦ 1999 年，湖南沅陵县发现西汉第一代沅陵侯吴阳之墓，可证明史籍有关沅陵侯封于武陵郡沅陵县的记载无误。见湖南文物考古研究所《沅陵虎溪山一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 年第 1 期。

⑧ 景帝三年，吴王刘濞反叛，曾致书“故长沙王子”，嘱其“因王子定长沙以北”。揣其文意，刘濞当是鼓动吴浅、吴阳借助乃父吴芮的影响自定长沙国，则二人当同居于长沙国故地。

⑨ 以上引文俱见《水经注疏》卷三九，第 3216 页。

酈道元的说法是可信的。

无论是从西汉王子侯国分封之通例，还是本于《水经注》的记载，吴浅之便侯国都应当是桂阳郡之便县。但是35号木牒表明，汉武帝时期的便侯国地处南郡无疑。那么，应当置侯邑于长沙国境内的便侯国何以出现在南郡？就西汉侯国制度来看，笔者以为这有可能是侯国迁徙的结果。

两汉时期，侯国迁徙较为常见，但由于史料记载不详，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十分有限。^①《汉志》所载侯国分布主要是西汉晚期元延、绥和年间的情况，而这时的很多侯国都已发生迁徙，并非初封所在。如前面提到的富平侯国原本在陈留郡，《水经·河水注》引《陈留风俗传》曰：“陈留尉氏县安陵乡，故富平县也。”酈道元曰：“是乃安世所食矣。”^②宣帝神爵、五凤年间，张延寿之富平侯国与别邑一同省并，其侯邑徙封平原郡。《张延寿传》曰：“天子以为（延寿）有让，乃徙封平原，并一国，户口如故，而租税减半。”^③《汉志》及《外戚恩泽侯表》均将富平侯国列属平原郡，这其实是侯国迁徙后的结果，并非初封所在。相似的例子还有舂陵侯国。舂陵侯国，《汉志》载属南阳郡。但《后汉书·城阳恭王祉传》载：“节侯买，以长沙定王子封于零道之舂陵乡，为舂陵侯……元帝初元四年，徙封南阳之白水乡，犹以舂陵为国名。”^④可知舂陵侯刘买初封于长沙国舂陵县，别属零陵郡，后徙侯国于南阳，原舂陵县省入零陵郡零道为舂陵乡。故舂陵侯国见载于《汉志》南阳郡，而不见于零陵郡。周振鹤先生指出：“一般侯国倘若迁徙，其原址往往省入他县以为乡亭，故大多无考。”正如周先生所言，侯国迁徙后，原址大多省并，这就给我们分析侯国迁徙带来了困难。像富平侯国和舂陵侯国，在迁徙后其原址省入他县，所以在《汉志》陈留郡和零陵郡下并没有富平、舂陵之名。若没有张延寿和刘祉本传的记载，仅凭《汉志》、《汉表》我们很难知晓两侯国发生过迁徙。

不过，一些侯国在迁徙后，原址并未省并，这就留下了侯国迁徙的线索。如《汉志》江夏郡载有钟武侯国，而零陵郡下另有钟武县。据《汉书·王子侯表》，钟武侯为长沙顷王子。若按照王子侯置侯邑于本王国的通例，则钟武侯国不当在江夏郡。钱大昕考证：“王子侯表有钟武侯度，此即度所封也。志有两钟武县，一属零陵郡，一属江夏郡。度为长沙顷王之子，其初封必在零陵之钟武，而志以江夏之钟武为

① 目前学界对汉代侯国迁徙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文帝时期的侯国迁徙政策，对其他时期的侯国迁徙状况则鲜有涉及。有关文帝时期的侯国迁徙政策可参见李开元《西汉软国所在与文帝的侯国迁移策》；陈苏镇《汉文帝“易侯邑”及“令列侯之国”考辨》。

② 《水经注疏》卷五，496页。

③ 《汉书》卷五九《张延寿传》，第2653—2564页。

④ 《后汉书》卷一四《城阳恭王祉传》，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年，第560页。

侯国，盖后来徙封。如舂陵侯本在泠道，后移于南阳也。”^① 周振鹤先生亦指出：“《汉志》零陵、江夏皆有钟武，后者注明侯国。大约钟武先由长沙别属零陵，继而迁往江夏。零陵原钟武县仍保留，未予省并，故两郡皆有钟武。”^② 可见钟武侯国发生过迁徙，《汉志》江夏郡下的钟武侯国已非初封所在。钟武侯国迁徙之事，史无明载，但因《汉志》江夏郡、零陵郡同时存有钟武，才保留了侯国迁徙的痕迹。

现在，35 号木牍的发现则为我们了解便侯国之迁徙提供了线索。根据木牍可知，在汉武帝早期南郡和长沙国同时存在有“便”，一为侯国，一为县。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应当与“钟武”类似，即长沙国的便县是便侯国始封所在，南郡的便侯国则是侯国迁徙的结果。分析长沙国沿革变迁，我们似乎也可找到便侯国迁徙的原因。高帝时期，吴芮之长沙国领有长沙、武陵、桂阳三郡。惠帝元年，于长沙郡便县置吴浅之王子侯国。^③ 文帝后元七年，长沙靖王薨，无后国除，三郡收归汉廷。景帝二年，景帝以长沙郡置国，封子刘发，是为刘氏长沙国。刘氏长沙国之建立值得注意，因为此时便侯尚存，则刘氏长沙国境内遗存有吴氏王子侯国。笔者由此推测，便侯国当在刘氏长沙国封立后被迁出，重新安置于中央直辖的南郡之中。^④ 35 号木牍所记载之便侯国已非初封所在。

据《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第三代便侯广志于景帝六年嗣侯位。第四代便侯千秋嗣位年代不详，于武帝元鼎五年“坐酎金免”。因此，35 号木牍所反映之便侯国当是广志或千秋在位时期的情形。元鼎五年，便侯国除国后，当改置为编县。之所以改为编县，而不是便县，有可能是为了与长沙国便县相区别。^⑤ 《汉志》南郡编县当是承自便侯国而来，并非如王先谦所说便侯国是从编县中分置。

① [清] 钱大昕著，方诗铭、周殿杰校点：《廿二史考异》卷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第 133 页。

② 《西汉政区地理》，第 124 页。

③ 便县，《汉志》属桂阳郡。但据周振鹤先生考证，便县乃为宣帝时期由长沙国削入桂阳郡。故宣帝以前，便县归属长沙国管辖。详见《西汉政区地理》，第 124—125 页。

④ 据《史记》卷一七《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景帝前元二年至四年，前元七年至中元三年，南郡曾短暂置为临江国，便侯国不会迁置于王国境内。故笔者推测，便侯国从长沙国迁出，当在景帝中元四年以后的某年，不会迟于武帝即位。

⑤ 编，古音读“方典切”，帮母元部。便读“房连切”，并母元部。方、房同为唇音字，故扁、便两字古音不仅同母，而且同部。两字同音，故可互借。古文字中可找到“便”、“扁”通同的字例。如鰾，《说文·鱼部》曰：“鰾，鱼名，从鱼，便声。鳊，鰾又从扁。”《广韵·仙韵》：“鰾，同鳊。”《史记》卷八九《张耳陈余列传》“上使泄公持节问之蓂與前”《索隐》引何休注《公羊》曰：“竹蓂，一名编。”又《论语·季氏》：“友便佞。”《说文·言部》引此文为：“友謏佞。”《字汇·言部》：“謏，与便同。巧言也。”有关古文字中便、扁通用的情况，详见戴家祥主编《金文大字典》“更”字条。（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年，第 1999 页）

四 余论

西汉一代政区变化十分复杂,由于文献记载过于简略,使之变化原委难述其详。《汉书》虽然留有地理志,但所载内容仅是西汉末年的行政区划,并不能为探讨西汉政区沿革提供充分的依据。因此,载有西汉不同时期政区资料的出土文献,对于认识西汉政区沿革显得尤为重要。张家山汉简《秩律》的公布,使我们对西汉早期的政区状况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此次载有汉武帝早期南郡政区资料的松柏汉墓简牍的发现,对研究西汉南郡政区变化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文通过对松柏汉墓35号木牍所载三侯国的初步探讨,发现该木牍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明确某些侯国的地望,解决一些历史上众讼不清的历史地理问题。而在明确这些侯国位置的基础上,再参照张家山汉简《秩律》、《汉书·地理志》相关记载,又可反映出汉初郡国分界以及南郡部分地段界址的变迁过程。更为重要的是,35号木牍还使我们对西汉地方行政制度以及侯国制度的某些问题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

汉代的县级政区分为县、道、邑、(侯)国四种类型,有关县、道、侯国的性质比较明确,但对于邑的认识却很模糊。由于《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列侯所食县曰国,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蛮夷曰道。”^①因此,长期以来对于邑的认识只有女性贵族汤沐邑一种类型。^②周振鹤先生在对史籍进行梳理后,又归纳出陵邑和奉郊邑两种类型。^③现在,通过对侯国别邑制度的深入探讨,再结合居延汉简“富平侯元城邑”的书写格式,我们有理由相信“侯国别邑”也应当是“邑”的一种类型。由此联想到尹湾六号汉墓出土木牍所载东海郡下辖38个县级政区中有胸、况其两邑^④,鉴于汉代列侯所领别邑鲜见于记载,笔者以为不能排除两邑为侯国别邑的可能。

以35号木牍为契机,我们对西汉侯国别邑制度也可得出几点认识。第一,侯国别邑如同侯国一样,可以由下一代列侯袭承。若本文分析不误,南郡中庐当是文帝益

^① 《汉书》卷一九,第742页。

^② 其实男性贵族也可领有汤沐邑。柳春藩先生曾注意到诸侯废王和皇帝也可领有汤沐邑(见《秦汉封国食邑赐爵制》,第112页)。而据《汉官旧仪》“内郡为县,三边为道,皇后、太子、公主所食为邑”的记载,可知太子也可领有汤沐邑(见[清]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50页)。

^③ 所谓陵邑,是指在皇帝陵墓旁边所置的特别县,专为奉祀陵园之用。奉郊邑是出于宗教奉祀需要而设立的特别县。详见周振鹤《西汉县城特殊职能探讨》,《历史地理研究》第1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81页。

^④ 尹湾汉墓一号木牍《集簿》记载东海郡下辖“县邑侯国卅八,县十八,侯国十八,邑二”。由五号木牍可以看出,这两邑是胸和况其。参见连云港市博物馆等编《尹湾汉墓简牍》,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

封给第一代襄平侯纪通的别邑。而木牍所涉应是第二代或第三代襄平侯，说明此时中庐仍为襄平侯所领有。另据《汉书·张安世传》，宣帝益封张安世之魏郡别邑，至子张延寿嗣侯位时尚存，也可证明别邑可以世袭。第二，明确了侯国别邑为“邑”的一种类型，再结合尹湾汉牒所载县邑吏员配置，侯国别邑应当只置有令长，而不是像侯国置有国相、家丞两套官员系统。侯国别邑在行政上受郡统辖更为直接，列侯只能收取别邑租税，而不能参与管理。这表明，邑的设置带有很强的临时性，随时都可以恢复为县。第三，通过对富平侯、博陆侯所领别邑的分析，可以发现列侯所益封的别邑户数，往往多于本食邑的户数。这说明别邑的分封带有嘉奖的用意，列侯在立有大功时才会得到益封别邑的殊荣。而侯国别邑也应当与皇家宗室所食汤沐邑一样，体现了皇帝对列侯的特别恩宠。进而言之，《史记》、《汉书》中常有列侯因功因宠而益封户数的记载，以前因对侯国益封制度认识不足，大多以为益封户数是从侯国周边乡县划并而来。现在看来，这其中必有相当比例是以别邑的形式益封，西汉列侯益封制度很有重新检讨的必要。

35 号木牍所载“便侯国”，不仅明确了《汉志》南郡编县是承自便侯国而来，还揭示出便侯国曾发生过迁徙。西汉一代，侯国迁徙十分普遍，但大多不见记载。35 号木牍因为保留了便侯国之名，使我们得以窥知南郡便侯国与长沙国便县之间的承袭关系。而《汉志》中常有名称相同的县和侯国分载于不同郡国的现象。如中山国有新市县，巨鹿郡有新市侯国；东海郡有新阳侯国，汝南郡有新阳县。这不禁让人怀疑这有可能是历史上侯国迁徙所留下的痕迹。若能将这些地名一一考订，相信一定会钩稽出更多侯国迁徙的事例，这对于我们认识西汉侯国迁徙制度将大有裨益。

35 号木牍仅载录四个侯国，就牵涉到侯国迁徙和侯国别邑，这绝不会是南郡独有的现象，亦应存在于其他汉郡。这样看来，西汉的列侯迁徙和侯国领有别邑的情况并不鲜见，而这些在《汉志》中难有反映。相信随着出土材料的日益丰富，我们对西汉的侯国制度会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作者马孟龙，1981 年生，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08 年 12 月 19 日